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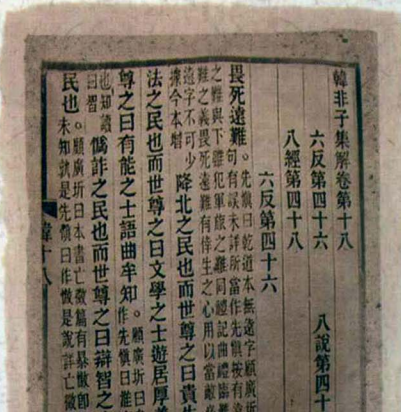
韩非子

与中国传统政治艺术

有人说他是中国法治主义的鼻祖，也有人说他是权谋大家：
他口吃木讷，却文笔犀利；他是伟大的寓言家，又是个人悲剧的主角……
他就是千古争鸣的韩非子

長
春
出
版
社

张亲霞／著



韩非子

与中国传统政治艺术

長 春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非子与中国传统政治艺术/张亲霞编著.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5445-0694-6

I. 韩… II. 张… III. ①法家②韩非子—研究 IV. B226.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3232 号

韩非子与中国传统政治艺术

著 者: 张亲霞

责任编辑: 张 樱 杨爱萍

封面设计: 田 穗

出版发行: 长春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431-88561180

总编室电话: 0431-88563443

读者服务部电话: 0431-88561177

地 址: 吉林省长春市建设街 1377 号

邮 编: 130061

网 址: www.cccbs.net

制 版: 恒源工作室

印 刷: 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198 千字

印 张: 12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431-87923413

| 前 言 |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社会大变革时期，也是一个极为动荡的时期。西周以来建立在宗法制、分封制基础上的权力体系基本崩溃。西周时期，周天子是最高的统治者，诸侯国虽然在自己所属的封国内部享有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一些基本权力，但在各个方面受到周天子的严密控制，周天子可以随时征调诸侯国的军队，剥夺诸侯国的封土和人民。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权力式微，丧失了控制诸侯的实际权力，此消彼长，诸侯国的势力则大大增强。“政由方伯，诸侯恣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春秋时期各国纷纷争当霸主，周天子还是各诸侯国争霸时所打的一个名义上的旗帜。到了战国时期，各国就连这个名义上的旗帜也不打了。失去了高高在上的权力的禁锢，诸侯国变得更加肆无忌惮。战国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年代，大国吞并小国，实力强的国家欺负弱小的国家。战国也是一个以实力说话的年代，谁能攻城略地，谁就能横行天下。在激烈、残酷的兼并战争中谁的实力强，谁就能战胜对方，谁就可以召集诸侯，耀武扬威。因此，这一时期各诸侯国莫不竭其所虑、尽其所能使自己的土地再广阔一点，让自己的民众再多一点。韩非就生活在这样的年代。

韩非，战国末期韩国的宗族公子，喜好刑名法术。韩非口吃，说话不利索，但是文笔却洋洋洒洒，犀利异常。韩非著述针砭时弊，看问题尖锐深刻，深受秦王的喜爱。据《史记》记载，秦王见到韩非写的《孤愤》、《五蠹》很是兴奋，感慨地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秦王爱才心切，因急于得到韩非这样能助己一霸天下的人才，不惜兴兵攻打韩国。韩非在韩国曾经屡次上书韩王，希望韩王在国土日削、国家生死存亡之际能够励精图治、振兴韩国。遗憾的是韩王非但不能体恤韩非的良苦用心，不采纳韩非的意见，而且根本就没有意识到韩非是一个人才，一个能使夹缝中生存的韩国





摆脱困境的人才。因此,当秦国大军压境之际,韩王理所当然地决定:以派韩非出使秦国的借口,把韩非拱手送到秦国。

历史往往阴差阳错。韩非到了秦国之后并没有受到秦王的重用。韩非的同学李斯嫉妒韩非的才能,更害怕将来韩非得到秦王的重视而自己受到冷落,于是就在秦王面前陷害韩非,说韩非终究是韩国的人,从人之常情来看韩非终会为韩国出力而不会真心替秦国效劳,但是假如让韩非就这样回到韩国去,这对秦国来说就无疑放虎归山,后患无穷,不如将其处死。秦王听信李斯的谗言,关押了韩非。后来,李斯又趁机设计毒死了韩非。韩非就这样最终死在自己的同门之手。后来秦王后悔,想要起用韩非,但是一切已经晚了。

在激烈的兼并时代,韩非深刻地认识到增强国家的实力对统治者来说是当务之急。正如韩非所说,一个连糠糟都吃不饱的人,不会去想大鱼大肉;一个连粗布衣裳都穿不上的人,也不会去追求锦绣衣衫。治理国家的道理也是一样,急需解决的事情还没有办好,不着急的事情就不必先操持。战国时期是一个实力较量的时代,韩非称之为“争于力”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富国强兵才是国家的当务之急。韩非云:“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故治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韩非·五蠹》)俗话说,穿上长袖衣服跳舞才好看,本钱多了才好做生意。有好的条件做起事来才比较容易。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国家安定强盛,谋划政事就容易;国家衰弱不堪,再好的计划也难以实现。韩非政治艺术的核心就是围绕增强国家实力,提高君主统治的效率,增强君主的权势,富国强兵的政治艺术。

古人云,立德、立功、立言为人生的三不朽,韩非的不朽在于立言——著书立说,韩非在思想理论方面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韩非的主要著作《韩非子》是秦灭韩之后由秦朝主管图书档案的御史编辑而成的,当时称为《韩子》,共十余万字,分为55篇,其中《存韩》后半篇是李斯的言论,其他文章都出自韩非。韩非是法家思想的典型代表。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是战国时期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以法治思想为核心的一个学派,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一家。《汉书·艺文志》称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农家、杂家为“九流”,法家是九流之一。法家的思想源头可上溯于春秋时的管仲、子产。战国初期的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对法家思想做了进一步的发展。韩非在法家前辈的基础上,汲取道、墨等家的思想,结合当时社会的变化,形成

了独具特色的法治思想。

韩非子的法家思想为君主集权的秦王朝的建立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汉承秦制”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这就是我国古代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秦倾覆以后,尤其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法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派,已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但是,在管理领域尤其在国家管理领域中,韩非的法治管理思想并未退出历史舞台,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汉宣帝就曾言,“汉家有制度以来本是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这里的“霸道”就是法家所说的以力服人之道,指的主要是法家的思想及其与法家思想相关的制度,主要通过政治震慑发挥功效,使人们意识到政治制度的权威性。而“王道”则是指儒家所说的以德服人之道。儒家政治文化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外在的、显层次的文化,法家文化则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内在的、隐层次的文化。儒家、道家、法家等共同作用形成了独特的、有民族特色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可以说韩非的法家思想与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确立、运行、发展有密切的联系。韩非的政治管理思想、管理艺术对中国社会的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传统认为法家思想多为阴谋权术,是帝王术,是中国传统文化阴暗面的体现。其实,韩非子思想中既有政治权谋也有政治艺术,政治艺术多于政治权谋。政治艺术是指政治运作过程中在细节上具体表现出来的技巧性、审美性,而政治权谋总是和心机、谋划,和阴谋诡计等联系在一起。政治艺术一方面是美的,它是人类对美的追求在政治领域的体现,另一方面又是真的,它是人性之真在政治领域的自由展示。政治权谋是丑的体现,它体现了人性中的自私自为,体现了人性中卑鄙龌龊、冷酷无情的一面。政治艺术和政治权谋在现实中好像很难区分开来,历来法家尤其是韩非子被看做刻薄寡恩、玩弄权术的代名词,其实我们只要拨开罩在韩非理论外表的迷雾,从具体的语境,从理论的整体,联系人性之实,从现代管理的角度解读韩非子,我们会发现韩非子并不简单地是一个玩弄权术的阴谋家,他同时也是一个政治理论家,一个对政治艺术有独到见解,对中国传统政治艺术有独特贡献的理论家。

政治艺术和政治权谋之间的现实区别就在于一个度。这个度把握得好就是艺术的,是美的,一旦超过这个度,政治艺术就会演变为政治权谋。以君臣关系为例:韩非子在中国历史上首先看到了政治关系实质是一种交易关系,是





以利为核心的交易关系，“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重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韩非·难一》）。君臣之间没有血缘关系，君臣之间是赤裸裸的交换关系。在这种交易关系中，君主拥有的是利禄，臣下拥有的是智慧和力量。韩非子这种看法虽然很残酷，但是却很清醒、很现实。韩非子的政治艺术就是建立在这种清醒与现实的基础之上的。君臣关系实质上是利益交换关系，但是它又和市场上的直接的买卖关系不同，只有艺术地处理这种关系才能使交换的双方获得各自的最大利益。因此，韩非子主张一方面君臣之间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君就是君，臣就是臣，君主要有君主的威严，臣下要承担臣下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另一方面君臣之间又要做到相互协调，配合默契。韩非说：“人主之患在莫之应，故曰：‘一手独拍，虽疾无声。’人臣之忧在不得一，故曰：‘右手画圆，左手画方，不能两成。’故曰：‘至治之国，君若桴，臣若鼓。’”（《韩非·功名》）君臣上下和谐是美，没有臣下相应的君主是孤独的，没有君主鼓励的臣下是忧虑的，只有君臣上下共同合作才能奏出和谐的音调，国家才能得到很好的治理。韩非通过形象生动的言语说明了君臣之间的辩证关系。韩非其实在告诉我们，处理君臣关系需要在君臣之分与君臣之和之间把握合适的度，这样二者之间的关系才能处理得比较完美。这就是政治艺术。

而政治权谋则不同，还以君臣关系为例。君臣关系中的权谋应该表现在君主怎样处心积虑地控制臣下，臣下怎样处心积虑地夺取君主的权势，君臣之间如何相互算计。客观地说，韩非子的理论中有阴谋权术的成分，尤其是在韩非子的挟知而问、疑诏诡使等防奸术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但是韩非子认为臣下处心积虑地夺取君主的权势这是奸情的体现，是应该得到遏制的政治现象。作为君主来说，他主张君主要靠权势，运用法、术来控制臣下，并不赞成纯粹地依靠君主的一己之智，依靠阴谋诡计来控制臣下。

从韩非思想的整体来看，韩非思想中的政治艺术也是多于政治权谋的。传统认为韩非的思想是法、术、势的统一，其实在韩非的思想中法、术、势这三者并不是并列、并重的。韩非思想中，权势是君主进行统治的基础，法、术是君主统治的必备手段。权势和法都是君主治理国家中的独立的要素，但是术却不同，我们把它称之为渗透性要素，因为它要通过法和权势实现，没有脱离法和权势的独立的术。在韩非思想中，术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上的术就是统治术，它贯穿于韩非整个治国思想。统治术实际上就是讲统治的艺术。狭义



上的术,是君主驾驭臣下的七种方法,也就是韩非说的“七术”,即:“一曰众端参观,二曰必罚明威,三曰信赏尽能,四曰一听责下,五曰疑诏诡使,六曰挟知而问,七曰倒言反事。此七者,主之所用也。”(《韩非·内储说上》)这七术中有统治艺术的含义在内,也有心术成分在其中。“众端参观”、“必罚明威”、“信赏尽能”、“一听责下”基本上就是统治艺术,而“疑诏诡使”、“挟知而问”、“倒言反事”虽然基本是阴谋权术,但是仍含有政治艺术的成分。以“疑诏诡使”为例。韩非举了这样一个事例:有一个叫庞敬的人是个县令。有一天他派遣管理市场的人和一个小王公大夫一起去市场,半道上差人把王公大夫叫了回来,也没有对他说什么,又让他回去了。那个管理市场的人就此以为县令肯定对这个王公大夫有什么特别的指示,对自己有所提防,所以在市场管理中就不敢胡作非为。这个故事意在提示君主应该像这个县令一样,用心术控制臣下。如果单从韩非举的事例来看,我们可以认为韩非主张阴谋和欺诈。但是我们撇开表面现象从目的来看,韩非认为之所以要这样做其实是想通过制造神秘感,强化君主对臣下的控制能力,树立君主的威严。韩非利用了人的多疑心理,使王公和市场管理者之间形成一种权力制衡,因此也有管理艺术的成分在内。所以我们不能笼统地把韩非思想和政治权谋简单地联系在一起。韩非子的政治思想中大部分是政治艺术,只有相当少的一部分是阴谋权术。如果以十分来看待韩非的政治思想,政治艺术应该占七分,阴谋权术则只占三分。

在当今民主政治成为世界总趋势的情况下,韩非思想体系的本质——极端专制的中央集权、君臣等级制度等显然已经落伍、过时,成为逆当今历史潮流的东西了。强调专制,维护极端专制的中央集权政治,主张君主对臣下的绝对控制等,用今天的眼光看,这些无疑是韩非思想中的糟粕,在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中这些东西已经没有立足之地,更无继承、借鉴的必要。然而,即使在这个问题上,似乎也不应该简单从事,并由此引申出韩非思想体系与现代政治无关的结论。因为韩非的专制集权思想是和“治民”、“治国”等内容联系在一起的,韩非思想中的“治民”、“治国”等内容在现代政治中并没有完全过时,仍有现实意义。我们只要稍加思维转换,就会看到韩非的治民、治国,是政治上的管理者控制被管理者,使他们按照管理者(君主)的意志办事。站在一般管理的角度,从政治运作、政治管理的立场来看韩非子的政治理论,而不仅仅是从韩非理论与君主制度的关系角度理解韩非的思想,从现代管理的新视角重新



解读韩非子,我们会发现其实韩非政治理论中有许多值得我们现代人品味的东西。韩非论述的一些管理方法、管理技巧在现代民主政治建设中仍有借鉴的价值,在甄别的前提下仍有继承的必要。

总之,韩非对于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态度和对历史发展趋势的敏锐观察力,不仅达到了先秦思想家的至高水平,同时亦为后世提供了一面映照官僚政治运作的镜子。韩非的政治思想涉及君主集权政治制度、等级制度等内容,也包含有政治管理的艺术和技巧方面的内容。前者已经过时,后者仍有较多的合理内涵。韩非思想中的这些合理内涵是我们今天研究、借鉴韩非政治管理思想的立足点、出发点。

目 录

第一章 虚静无为之术

一、含而不露	2
二、无须事必躬亲	6
三、法、术、势结合以致无为	8

第二章 政治洞察之术

一、缘道理以从事，事半功倍	11
二、因人情，因人自为	13
三、见微知著	20
四、因参验审言辞，耳清目明	23
五、矛与盾的权衡	26

第三章 以法治国的艺术

一、法正国强，法明忠劝	30
二、法与权势的辩证艺术	34
三、法与“术”的辩证艺术	37
四、法与情智的辩证艺术	41
五、法的稳定和变易的辩证艺术	47





第四章 赏罚的艺术

一、赏功罚过	51
二、法外不赏	59
三、厚赏重罚，轻罪重刑	62
四、信赏必罚	69
五、赏罚、毁誉的辩证法	72
六、赏罚中的功过与人性的辩证法	79

第五章 势治的艺术

一、众人相助	82
二、以利导民	84
三、治吏不治民	88
四、下守其职	91
五、防止下借上之势显贵	94
六、防止不适当的仁慈	95

第六章 用人的艺术

一、以法择人 量功授官	98
二、不避亲仇	105
三、专职专任，不兼官做事	108
四、用人所长，避人所短	110
五、循名责实	111
六、因功逐级提升	113
七、善用忠臣	114
八、启用法术之士	119

第七章 政治语言的使用艺术

一、政治谏说艺术	125
二、政治倾听艺术	132
三、治理政治诽谤的艺术	150

第八章 法家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化

一、法家与君主集权	163
二、法家的赏罚公正与法的等级性	166
三、法家的政治艺术与阴谋权术	168
四、法家的政治艺术与道德的关系	171
五、法家的政治艺术与功利	173
六、法家的政治艺术与权势	175



第一章 虚静无为之术

虚静无为是老子在《道德经》中首次提出的，老子提出“致虚极，守静笃”。“虚”、“静”指心灵的宁静，老子主张人应该化解物欲的执为心，使心灵虚静空明。老子还主张无为，并且把无为看做是治国的最高境界，老子希望通过无为达到无不为。老子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道德经》）无为在老子的政治思想中是一种不干涉的政治策略。总之，在老子的思想中，虚静无为既是一种修身术也是一种政治艺术。

老子的虚静无为被稷下道家发扬光大。稷下道家主张虚静，认为应使心“无藏”、“无求”、“无设”、“无虑”，不要为忧乐、喜怒、欲利等主观情感欲望所困扰，否则心就不能虚静，不能虚静就会烦躁，烦躁就会导致精气的丧失。稷下道家认为精气是生命之根，人如果失去精气，生命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因此，《管子·心术上》强调君主应该把虚静作为行为的基本准则，认为“虚者无藏”，无藏则“无形”，君主心无成见，无主观好恶，亦不轻易表达自己的好恶，如此深藏不露就可做到以虚控实，就可以指挥、驾驭臣下。“心术者，无为而治也”（《管子·心术下》）。总之，在稷下道家那里，虚静之道进一步和君主治理国家结合在一起，成为君主无为而无不为的治国术。

汲取道家思想，韩非的心目中虚静无为是最高的治世境界，同时也是治世的最高艺术。韩非的思想和道家的无为政治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司马迁对此早有十分明晰的看法。《史记》中司马迁把老子和韩非拉在一起作传，题为《老子韩非列传》。老子是一个哲学家，“道”是老子哲学的基本范畴，但是这个道在老子的思想中多为形而上的含义，是宇宙的规则，是世界之源，万物之本。老子的哲学中“道”先于天地万物而生，同时又是天地万物生长发育的自体根源，它养育万物，使万物得以生长、成熟。道的规律作用于万





物才产生了万物的规律。韩非把老子形而上的道具体化为做事之道，具体化为政治生活中的道，具体化为政治生活的基本方法。这种方法集中体现在韩非的思想中就是“虚静无为”的政治艺术。韩非虚静无为思想的哲学基础就是道家的“道”。韩非云：“故虚静以待，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有言者自为名，有事者自为形，形名参同，君乃无事焉，归之其情。”（《韩非·主道》）韩非又云：“虚静无为，道之情也。”（《韩非·扬权》）韩非的虚静无为从政治艺术的角度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

一、含而不露

韩非子认为道的深奥、玄妙就在于其“不可见”，“不可知”。韩非云：“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虚静无事，以暗见疵。”（《韩非·主道》）因此道在现实政治中的运用也要体现出这个特点来。首先作为统治者要深悟道的玄机，做到深藏不露。“函掩其迹，匿有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绝其能，下不能意。”（《韩非·主道》）不要随便显示自己是多么的聪明，也轻易不要显示自己多么有能力、有才干，要让属下无法揣度；要善于掩盖自己的行迹，隐藏自己的想法，让属下无迹可循。也就是说，作为统治者一定不要被属下看透，要做到深不可测。

君主含而不露，具体地说就是不轻易把自己的爱好、愿望、喜怒哀乐等表露出来。轻易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就会生出许多事端，带来很多的麻烦。韩非认为：“喜之则多事，恶之则生怨。”（《韩非·扬权》）就是说君主的喜怒哀乐一旦表达出来就会有消极的一面。君主如果表现出喜欢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情，就会生出许多事端来，比如趋炎附势的人就会依据君主的喜好来说话和做事，把自己的真实想法隐藏起来；君主如果表现出讨厌一个人的某种做法，就会引起对方内心的怨恨，让对方生出许多怨气来。因此，君主含而不露，可以防止属下投其所好，趋其所爱，这样溜须拍马之人就不会蜂拥而至。韩非《外储说右下》有这样一个故事：公仪休是鲁国的相国，他有一个嗜好就是特别喜欢吃鱼，朝野上下许多人都知道他的这个嗜好，于是上上下下认识他的人以及那些想求他办事情的人都投其所好买鱼送给他。不料，公仪休却不接受他们送的鱼。他的弟弟很是奇怪：“你不是很喜欢吃鱼吗？为什么不接受人家送来的鱼呢？”公仪休说：“正因为我爱吃鱼，所以才不能



接受人家送来的鱼。如果我收了人家的鱼，就免不了口软手软，对人家露出低三下四的神色，做事就难免徇情枉法。我如果徇情枉法，说不定哪一天就会被革去相国的职务，到了那个时候我再喜欢吃鱼也不会有人给我送鱼了。而没有了俸禄，自己也就买不起鱼，也就没法吃到鱼了。”在这个故事中公仪休就是随便暴露了自己的嗜好，给自己带来了这些麻烦，但所幸的是他明智地避免了给自己带来更大的麻烦。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像公仪休那样明智、冷静的人并不多见，所以便有许多贪官因为别人投其所好而落马。因此，最好的做法是不显露自己的主观爱好，以免给别人以可乘之机。

含而不露也包括不能显露哪怕是虚假的情感。例如假装爱人或者恨人。假装爱人或者假装恨人都会使自己陷于很被动的局面。一个君主如果一旦假装爱一个人，他日再公开恨这个人就比较困难；一旦假装恨某个人，以后要是再公开表示爱这个人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假装憎恨的感情稍有所表现，奉承的人就会根据这个去诋毁或者赞扬某人，等到这个时候许多事情再想收回就很困难了。韩非《外储说右下》通过历史教训生动地说明了这个道理。隐士潘寿对燕王说：“大王不如把国家让给大臣子之。人们所以称赞尧很贤明，是因为他把天下让给了许由，而许由又肯定不接受，也就是说尧有让天下的名声而实际上又不失去天下。现在大王如果把国家让给国相子之，子之肯定不接受，这样一来大王就既有让国家给子之的名声，可以与尧一样同享美名，又不会失去天下。”燕王听信了潘寿的一番花言巧语，就把国家整个地托付给了子之，这样一来子之在燕国的地位越来越尊贵，势力越来越大。最后燕王失去了王位，王位为子之夺取。韩非认为潘寿让燕王假装爱国相子之，把手中的权力拱手送给了子之，加强了子之在燕国的势力，这本身就是错误的。君主的权力在任何时候都是不能和大臣共享的，所以君主不能因为假装爱子之，让子之和自己一起分享权力，最后导致局面无法挽回，燕王自己只得退位，把王位让给了子之。也就是说，一个君主在假装爱人或者假装恨人的时候，付出的不只是情感这么简单，爱恨情感背后附带的是权力的给予和剥夺，因此作为君主，对待哪怕是虚假的情感也一定要谨慎。

韩非说：“主上不神，下将有因；其事不当，下考其常。若天若地，是谓累解；若地若天，孰疏孰亲？能象天地，是谓圣人。”（《韩非·扬榷》）也就是说，君主如果没有神秘莫测的地方，臣下就会给自己的行为找到根据；君主如果处事方式不当，臣下就会把这种行为当做成例或是典型，来为自己的不当行为开脱。



我们理解韩非这里所说的神秘感不应是故弄玄虚的神秘莫测，而应该是沉着冷静；不轻易表示爱憎，不是故作矜持，而是为了集思广益，避免偏执，力求全面。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有天地般博大的胸怀。韩非认为这种人应该“若天若地”，指出“能象天地，是谓圣人”。因为天覆盖万物，地承载万物，天地是最富有包容性的，只有圣人才能有天地般的胸怀。

从反面来说，如果一个君主（领导者）事先把自己的想法都说出来，那么属下在一定程度上就不敢表露自己的意见，如此一来隐恶抑善之类的事情就会时有发生。交流有了妨碍，君臣上下之间信息沟通的通道就会被堵塞。

另外，一个君主治理国家，君主用两只眼睛看全国，而全国则有成千上万只眼睛盯着国君。就像一个射鸟的人，群鸟有几百只眼睛，而你只有两只眼睛盯着它们，防备着它们。如此一来可以说是防不胜防。所以，作为君主治理国家，就要虚静无为，不要随意把自己的欲望表露出来。韩非认为虚静无为就好比对于一个射鸟的人，一定要谨慎对待自己的谷仓，防护好它，防止鸟儿来偷食；而对于一个治理国家的人来说，守护好自己的谷仓，就是要守护好自己的欲望，不要让欲望随时显露出来。君主虚静无为才能守护好门户，而显露自己的欲望就好像是关门却没有拴上门栓一样，会为盗贼、奸人轻易进入留下机会。

韩非《外储说右上》中用一个故事生动地说明了这个道理。齐威王的夫人死了，齐威王有10个妃妾都是他所宠爱的，齐威王会立哪一位为夫人呢？大臣们都在猜测这件事情。当时薛公是齐国的国相，他想，如果自己能提议立某个人为齐威王的夫人，而这个人又恰好也是齐威王心中想立为夫人的人，那么自己在齐威王面前的声望就会大大地提高。但是齐威王究竟最喜欢哪一个妃妾？薛公经过一番思谋，就买了10副耳环给齐威王，让他转送给这些妃妾，其中一副耳环的样子非常别致，做工也更为精美。第二天薛公就观察那副精美的耳环是哪一个妃妾戴着，便提那个人为夫人。结果，薛公提出的人选果然正中齐威王的下怀，得到了齐威王的认可。齐威王无意中显露了自己的偏爱，他的这个举动便为薛公所利用。薛公就用这种方式揣摩齐威王的心思，赢得了齐威王的欢心。

君主含而不露一定程度上也能起到遏制臣下妄为的作用。有的臣下凭借君主对他们的偏爱往往肆意妄为，为非作歹。如果臣下不知道君主的意图，做事就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以防出现闪失，让君主对自己有看法。

当然，君主不显露自己的嗜好并不是说君主就是无所作为的君主，而是



说君主首先要处于一种虚静的状态，这样才能保持冷静的头脑去观察，去倾听，去思考。也只有这样，才能让属下在君主面前充分地展示才华，显露性格，表现自己的偏好。只有属下畅所欲言，君主才能充分地了解属下的状况，掌握各种信息，真正做到心中有数。也就是说君主的深不可测、不露痕迹是行为决策的前提准备。君主只有做到含而不露才能以静制动，掌握主动权。

含而不露，从另一个角度说实际上就是要君主表面上装糊涂，若无其事，而实际上则是隐蔽自己，以无为达到无不为。汉初吕后和萧何诛杀大将韩信，清初16岁的康熙皇帝制服权臣鳌拜都是在深藏不露的情况下进行的。韩非子认为“浅薄而易见，漏泄而无藏，不能周密而通群臣之语者，可亡也”（《韩非·亡征》）。也就是说，如果在权力争斗中轻易暴露自己的内心世界就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导致国家的衰亡。《说林下》记载，听说公子纠将要作乱，齐桓公就派使者暗中去观察。使者回来后禀报齐桓公：“公子纠笑的时候看起来并不真正快乐，看东西的时候，眼睛里很空洞，好像什么也没有看见一样。”齐桓公就让鲁国人杀了公子纠，以绝后患。公子纠和公子小白（齐桓公）是弟兄两个，当时齐国国君齐襄公被杀，作为齐襄公的两个兄弟公子纠与公子小白都在国外。两个公子听到齐襄公被杀的消息，都急忙赶回齐国争夺君位。结果公子小白先到了齐国被立，称为齐桓公。齐桓公和公子纠在王位之争中势不两立，公子纠存在一天对齐桓公就是一天的威胁，齐桓公当然是除之而后快。但是公子纠如果懂得隐藏自己，不给齐桓公留下把柄，然后再伺机而动也不会这么快就为自己带来杀身之祸。

含而不露作为政治谋略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要国君韬光养晦。春秋时期，楚国长期混乱，楚庄王即位时很年轻，即位之初他并没有像其他的君主那样雷厉风行做事情，而是纵情享乐，不理朝政，整天声色犬马，不是带着卫士、美妾去云梦游猎，就是在宫中饮酒观舞。每逢大臣汇报国事他都显得很不耐烦，而且不允许大臣劝谏，否则以死罪论处。三年过去了，朝中政事混乱不堪，但是楚庄王仍然毫无悔改之意。大夫伍参冒死进谏，恰逢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于钟鼓之间。伍参请庄王猜谜语：“有鸟止于阜，三年不飞不鸣，是何鸟也？”庄王答：“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伍参回去以后，很是高兴，因为他让楚庄王猜的是“隐语”。但数月之后，庄王仍一切照旧，享乐更甚。大夫苏从又冒死进谏。庄王抽出宝剑，要杀苏从。苏从无所畏惧，坚持劝谏。于是，庄王停止淫乐，亲理朝政，并提